



自由談
楊不秋

樓下最近新開了一家店鋪，寬敞明亮。每次路過，都能看到店內人頭攢動，店門口也常有人龍。特意關注了才知道，原來是家頗有名氣的國際連鎖二手店，既售賣也回收，而且並不僅限奢侈品，大眾快消品牌也來者不拒。

我帶着好奇進店體驗，看到有衣服、手袋、鞋帽和配飾，全都分門別類，陳列有序。有能看得出使用痕跡的，也有看起來仍然簇新的。價籤上，奢牌會註明品牌，其他商品就只有標價，最平一檔售價不過港幣三十五元。雖說是隨便看看卻意外搜羅到一件 Vera Wang 小禮服，全真絲質地，新淨無瑕，盛惠港幣一百元。首次購入帶來了一種「買到就是賺到」的愉悅感，延續良久，還敦促我熱情飽滿地開始收拾家中閒置。如果說斷捨離的最大的絆腳石是猶豫和不捨，現在這些「放不下」完全被「立刻變現」這一具體而實際的回報一擊全退。

回收要稍許複雜點。首先是需要趕早排隊，因為每天只做限量回收且先到先得。然後，店家對可回收物品估價並給出報價。這家連鎖店在全球多地均有網點且運營多年，恐怕早就有了一套龐大而詳細的二手交易的數據。除了品牌、款式、新舊等因素，店家完全可以依據歷史成交進行

人與事
厲彥林

樂園（下）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回老家短住，家門口的竹園讓我感恩天地生靈，白天有鳥的音樂洗心，夜晚有明月下草蟲低吟。這無憂無慮的旋律，不僅陶醉我的耳朵，而且征服我的心靈。

陽光透過竹葉，篩下細碎的金色光點，灑在地上晃晃悠悠的。鳥鳴聲清朗起來，不再像清晨那般急急慌慌。偶爾傳來幾聲「咕咕」，與麻雀的噓噓聲一應一和。看看正在竹林邊並排刨食的鳥和雞，聽着不急不慢混雜的「嘰嘰」「咕咕」聲，心裏踏實。

雨後或雪後的竹林，閉眼細聽，竹葉晃動的聲音脆生生的，落地的「撲撲」聲柔軟又讓人心疼。我深深吸一口氣，竹葉的清香，花的微甜，與泥土的芬芳一股腦兒鑽進鼻孔，一下子整個人清醒了許多。

大公報
【大公報人物誌⑬】



等那輪明月再次爬過東山頭，縷縷清輝灑下來，竹林成了一幅水墨畫。這時候，鳥兒大都歇了，但總有那麼一兩隻，像是被月光驚了夢，偶爾叫喚幾聲，如石子掉進水潭，激起夜晚一圈圈寂靜的波紋。更多的是風聲——它是看不見的聽眾，也是高明的伴奏家。它拂過竹梢，發出「沙沙沙」的輕響，柔柔的，綿綿的，給靜謐的夜增添了坦然與踏實。天上的月牙兒，聽着這風與竹的夜曲，彷彿更亮、更近了，就掛在竹枝梢上，安靜地照着家家戶戶的窗戶。

二〇二二年清明節，我大妹妹和妹夫提前到集市上購買了沂蒙山區農村過去燒水的工具——快壺。我們兄妹幾個坐在竹林旁的紫藤樹下燒水泡茶喝，一會就能聽到水的沸騰聲。這時一群麻雀「嘰嘰喳喳」地棲落竹

林。

「我們喝杯早茶，還得音樂伴奏呀？」我妻子說。「這小竹林，就是個免費音樂廳。不用買票，隨時開唱。清風、明月和我們是聽眾，演奏者是這活蹦亂跳的小生靈」，我大發感慨。

兄弟姊妹們久別相聚的快樂，群鳥歡唱的熱鬧，還有這沙沙作響的竹葉和清香四溢的紫藤花、月季花的香氣，以及讓歌聲飛翔的純淨空氣，合奏出美妙動聽的生命交響曲。

蘇軾「不可居無竹」，劉禹錫「無地不相宜」，孟浩然「竹露滴清響」，是何等自在與安然。讀王維「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方知與天地明月為知己，便可享用脫俗的清歡。

「竹林裏彈撥的古琴聲，那使鳥兒如痴如醉，把月亮拉近心窩的琴聲……」美籍華裔詩人施家彰的這句詩，彷彿再現了我家門口小竹園的動人景象。

月光一寸寸挪過竹葉的斑影，一聲聲清脆的鳥鳴陪伴我的思緒。我家門前這方小竹林，竟將古人的風雅，化作現代人的心靈良方。它不同天氣與時辰的響聲——晨曲、細雨、風吟，確是我安放心靈、緩解鄉愁的樂園，是賜給每位普通人熱愛生命、珍愛生活的精神禮物。我自然成為竹林的一員。

清晨，太陽跳出山嘴，將金光揮灑成琴弦，又喚醒了竹林鳥兒的合鳴。竹葉沙沙，眾鳥暫歇，唯有那隻不知疲倦的麻雀，仍在枝頭獨自吟唱，執著地追問，「何時再泡一壺茶，共賞這天籟之聲？」

核心的分量

——歷史轉折的「決定性變量」

吳志良

一九三五年一月，貴州遵義，一幢灰白相間的二層小樓。

窗外是寒風中瑟瑟發抖的黔北小城，屋內是二十位共產黨人。此前數月，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後由八萬六千餘人銳減到三萬餘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初期嚴重受挫，中國革命命懸一線。

三天會議之後，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決定誕生了：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次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三個「挽救」，字字千鈞。

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八月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深刻指出：「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他在多次談話中反覆強調：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遵義會議起，以毛、劉、周、朱等為代表的領導集體逐步形成，中國共產黨才真正擁有了一個穩定而成熟的領導核心。

十四年——一個政黨用十四年、用無數鮮血和生命，才在絕境中「逼」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共二十八年，以遵義會議為界，前十四年在曲折中探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後十四年在正確路線指引下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分水嶺，正是遵義會議。

這絕非孤例。回望世界大國崛起的歷史，一條值得重視的線索浮現出來：每一個成功崛起的國家，在關鍵轉折點上往往擁有一個能夠凝聚共識、果斷決策的領導核心——當然，核心作用的發揮，又離不開特定的制度條件與社會結構支撐。

一五五八年，二十五歲的伊麗莎白，都鐸繼承英格蘭王位時，接手的是一個國庫空虛、宗教分裂、強敵環伺的國家。她的姐姐瑪麗一世血腥鎮壓新教徒，將英格蘭重新拉回天主教懷抱，短短三十年間國教政策反覆翻轉了四次。伊麗莎白即位後，通過一五五九年《最高權威法》與一五六三年《三十九條信綱》，重新確認了王權——教權的一元結構，同時以「中間道路」調和了激進新教徒與天主教殘餘之間的矛盾。她精簡政府機構，建立了一套嚴密的信息系統。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被她重新凝聚為一個有核心、有系統的整體。她的統治時期被稱為「黃金時代」，英格蘭不僅保持了統一，更在一五八八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為日後成為「日不落帝國」奠定了根基。

一八六二年，普魯士陷入憲政危機。議會拒絕批准軍事改革預算，國王威廉一世威脅退位，國家機器幾近停擺。俾斯麥臨危受命，於同年九月出任首相。他在眾議院發表演說，慷

慨宣告：「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而要用鐵和血來解決！」他依據「缺口理論」，在國王支持下繞開議會強行推進陸軍改革。不到九年，他發動三場戰爭——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將一個分裂了數百年的德意志民族，整合為歐洲第一流的大國。普魯士高度發達的軍國官僚制與容克貴族—君主制的制度慣性，使「鐵血」政策得以落地並延續。

一六八九年，彼得大帝從姐姐手中奪回權力時，俄國還是一個被歐洲遠遠甩在身后的落後封建農奴制國家。一六九七年，他作出了一個震驚歐洲的決定——化名出訪西歐，親自在荷蘭造船廠當木匠。回國後，他以「霹靂手段」推行全面改革：徵收大鬍子稅、推行西式服裝、逐步削弱波雅爾杜馬的職能、通過一七二一年《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將教會納入由聖主教公會代表的皇權管轄之下。他一生主持頒布了三千多條法令，將俄國從邊緣的落後國家強行拖入了歐洲強國之列——其改革之所以能持續推進，依託的正是俄國高度集權的農奴制國家機器。

每一個成功崛起的國家背後，幾乎都站着一位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的核心人物。而這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成事，其行動與所在國的制度傳統、社會結構形成了共振。

反面的案例同樣發人深省。一五六二年，法國爆發胡格諾戰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内戰，持續了三十六年之久。法國不是沒有能人——胡格諾派的領袖科利尼海軍上將、天主教陣營的吉斯公爵，都是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但他們代表的是各自的派系，而非整個國家。法國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缺少一個超越派系、能夠凝聚全民意志的領導核心，最終陷入了長達兩代人的血腥内耗。

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國際聯盟，擁有看似完備的制度框架，卻始終沒有一個能凝聚主要大國意志的核心——美國始終缺席，蘇聯被排斥在外，德國來了又走。當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國聯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撤軍時，日本於一九三三年直接選擇退出。一個被主要大國放棄的組織，其制度再完備，也注定難以有效運轉。

堅強領導核心的形成，從來不是歷史的必然配置，而是多重條件在特



▲遵義會議會址。

新華社

定時空節點上偶然耦合的珍貴產物。

歷史用無數正反面案例告訴我們：沒有核心，再完備的制度也可能淪為一盤散沙；有了核心，再艱難的困境也能找到出路。核心的出現不是浪漫的「英雄敘事」，而是在極端壓力下「逼」出的正確選擇，是付出慘痛代價後獲得的珍貴禮物。

文明走向在「分」與「合」的岔路口，有沒有一個能夠凝聚共識、果斷決策的領導核心，更影響着其最終走向。

然而，僅有核心人物還不夠。核心可以點燃火種，但只有制度才能讓火焰持續燃燒。一個僅有核心而缺乏制度支撐的組織，可能在核心離去後迅速衰落；而一個將核心權威轉化為制度力量的組織，則能讓「極低概率的好運」變成「可持續的優勢」。歷史的方向，終究是由核心的決斷與制度的韌性共同寫就的。

范長江



▲范長江。

資料圖片

江撰寫的《陝北之行》系列通訊，匯編成《塞上行》由大公報館在上海出版。

西北行結束以後，范長江被《大公報》聘為正式記者。「於是，自己內心發生了一個大問題，覺得這個職業關係社會太大，不是普通一個吃飯的事情，因此，我不知道怎樣做才對得起這個職務。自己想來想去，得不到解答。於是特別為此事去請教那時在北方大名鼎鼎的某前輩（指胡政之）。他當時給我一個法則說：『作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誠。』他說話的態度，很嚴肅而深沉。我那時渾身發熱，高興得不得了，好像名山訪道，如今已得了『一字真傳』，今後一生當受用不盡。我本着那個『誠』字，一直幹了三年。」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失守，一年多的時間裏，范長江跑遍了抗日主要戰場，先後在《大公報》發表戰地報道七十多篇，匯編成冊為《西線風雲》，計有約二十萬字。他的戰地通訊寫得真實動人，以敢言而著稱。

西安事變發生後，范長江隻身進入

西安，後轉赴延安，曾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他極為有名的一篇文章《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把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中共提出的四項保證內容及時公諸於世，極大地影響了未來政局的走向。

胡政之為此反反覆覆考慮再三，最後下決心要冒違檢風險，讓范長江連夜趕寫出來，不送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所，徑自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的上海版和天津版顯著位置同時刊出。據說蔣介石為此大罵張季鸞，但並沒有處分《大公報》。

《大公報》和紅軍長征結下過一段奇異因緣。時任中央隊警衛隊指導員、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先頭部隊攻佔哈達鋪的時候，在當地的郵局得到了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他們翻讀着這些報紙……知道：陝北有蘇區根據地，有紅軍，有游擊隊。」

抗日戰爭爆發後，范長江作為《大公報》的通訊課主任，帶領記者奔赴盧溝橋、南口、台兒莊、徐州、崑崙關等戰場。據孔昭愷記述，一九三八年任漢口的《大公報》編輯部，范長江與總編輯張季鸞有過激烈的爭吵，他被立即辭退，原因未知。

范長江一九四〇年與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的獨女沈譜結婚，他們育有四子。沈譜一九三九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化學系，曾在鄧穎超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

離開《大公報》以後，范長江與胡愈之等創辦國際新聞社。一九三九年在重慶，范長江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新華社總編輯、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